

国外汉语语言学研究现状

——《汉语语言学的新视野》评介

石定栩 香港理工大学

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终极目标,是为语言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并进一步探索人类认知过程的奥秘。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找出各种语言的共性,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代表人类语言本质的普遍语法来。寻求普遍语法,最理想的作法当然是把现存的和已经消失了的语言都包罗进来,从所有语言现象中加以归纳,退而取其次的话,则是包括的语言现象越多越好。正因为如此,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个类型或某个地区的语言,而是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所谓的重点,并非人为的选定,只是某一个现象引起了较大的关注,或是某种语言吸引了更多的研究人员而已。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国外对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无论是投入的人力,还是取得的成果,都成了现代语言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总结汉语语言学研究的成果,探索今后的发展方向,出版代表各个领域最新水平的著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汉语语言学的新视野》(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一书问世,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汉语语言学的新视野》由总部设在荷兰的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于 1996 年夏季出版,作为《自然语言与语言学理论研究》(Studies in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丛书的第三十六卷。本书的编辑者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的黄正德(C. F. James Huang)和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李艳惠(Y. -H. Audrey Li)。全书共分十章,由各方面的专家执笔,讨论汉语研究各个领域的进展和成果。下面逐章加以介绍。

0. 前言

黄正德和李艳惠在前言里指出,汉语语言学从七十年代开始迅速发展,不但在世界各地攻读汉语语言学的学生人数激增,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以汉语语言学为主的系科。随着研究人员的不断增加,以汉语语言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也多了起来。目前国际性的会议就有北美洲汉语语言学会议(NACCL),台湾中研院发起的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国际研讨会(1sCLL)和由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ACL)组织的汉语语言学国际会议(ICCL)。一九九一年开办了第一届汉语语言学暑期训练班,作为美国语言学会暑期学校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加州大学的 Santa Cruz 分校举行,本书的部分章节就是那次训练班的讲稿。

汉语语言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是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无论是按数量标准来计算,还是以质量标准来衡量,汉语语言学都已经攀上了新的高峰,开拓了新的视野。将这些成就总结出来,与研究汉语语言学的学生和学者共享,让所有的语言学家了解汉语语言学的进展,便是本书的主要的目的。

汉语语言学的传统源远流长,从汉朝开始到如今,音韵,训诂和方言研究一直是历时语言学研究的传统领域。近年来,对古代白话文献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并促进了比较方言语法的研究。与历时语言学的传统不同,汉语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受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

响很深,其长处不在于发掘新的语料,而在于对已有材料的重新整理与分析。共时研究对语言学理论做出的主要贡献包括声调音系理论,音系与句法的界面关系,词汇扩散理论,句法与语义的界面关系,句法中的词组结构,指代关系及疑问句理解等等。由于种种原因,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各走各的路,因而不利于相互取长补短。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将双方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便利大家切磋。本书的前六章就是按照这样的构思组织的。一至三章讨论的是按理论语言学方法进行的共时研究,四至六章说的是以语文学传统开展的历时语言学和方言的研究。编辑者希望汉语语言学能从此走出书斋,为现代语言学理论做出更大贡献,也让所有的语言学家都认识到汉语所能做出的贡献。

1. 从汉语看声调特征架

本章由加州大学 San Diego 分校的陈渊泉(Matthew Chen)撰写,讨论汉语的声调在现代音系理论中的地位,重点是升降调与变调。在回顾了汉语声调研究的历史之后,陈渊泉介绍了现代音系学表示升降调的两种理论方法。一种办法是把升降调作为一种旋律单位,用[±升][±降]之类的特征来描述,由王士元在六十年代提出。另一种是继承赵元任用 35,51 之类数字来标调号的精神,将升降调分解成平调的组合,把调值的升或降看成是高平调与低平调之间在切换过程中产生的圆滑衔接变化,此理论的代表人物是 Moura Yip(叶海娜)。前一种理论最初是建立在闽语循环变调现象基础上的,而后一种理论原本是用来解释非洲班图语的升降调的,因而在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非洲的声调语言同汉语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后来发现温州、镇海等方言的调值扩散也同样有切换中的所谓“边缘效应”,如降调在扩散时只把调值最低的那部分扩散出去,所以升降调的分解也应该适用于汉语。不过,近来又发现有些方言有着相反的特性,在调值扩散中表现出所谓的“整体效应”,象丹阳、长治等方言的调值扩散中,升降调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位进行扩散。对于这些显然互相矛盾的现象,Yip 在特征架(feature geometry)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解决办法,用两个不同的特征架层次来表示同一个升降调。在下面的终结层次(terminal level)上,该升降调分解为两个平调,而在上面的根基层次(root level)上,该调值则用一个单位来表示。在表现“边缘效应”的方言中,调值由终结层次扩散出去,而在表现“整体效应”的方言中,调值则由根基层次扩散出去。

陈渊泉接下来讨论了音调升降(pitch contour)和音域(register)之间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同音乐里的旋律与音高之间的关系很相象,在保持旋律的前提下,可以将音高降低或升高一两度。声调的这两个特征在音系理论里的地位是 Yip 建立起来的,她的观点是音域统辖(dominate)音调升降。而另一种观点是包智明提出来的。他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姐妹关系(sisterhood)。两种不同的理论关系会带来不同的实际后果。陈渊泉在详细讨论了实际语料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Yip 的观点能更好地解释汉语的事实,因而较为合理。

2. 近年来对汉语生成句法的研究

在这一章里,黄正德和李艳惠先简单回顾了汉语句法研究的历史以及同西方句法理论发展的对应关系,然后集中讨论十几年来汉语生成句法研究的丰硕成果。他们指出,近年来国外发表的汉语语言学论文中,讨论句法的占了多数,而其中大部分的理论基础都是 Chomsky 的管辖与约束理论,或者说原则及参数理论,这同当代语言学研究的现状正相吻合。

黄正德和李艳惠分四个方面介绍了原则及参数理论的基本观点以及汉语句法的研究成果,第一是所谓的组件性(modularity),就是把语法看成一个由若干组件合成的大系统,各个组件自成体系,但又互相作用,互相制约。汉语句法研究在词组结构和词序方面的工作,就是很好的例证。按照组件之一的 X-标杆理论的设想,汉语的每个词组都有一个核心,而其余成分

与核心的相对位置在一定阶段是固定的。其他的组件如论元理论(thematic theory)和格理论(case theory)则在不同阶段发挥作用,最终形成汉语所特有的表层词组结构和词序。对正反问句的分析也体现了句法的组件性,从不同组件的角度进行分析,原来混然一体的正反问句可以划分为三种,而且各有自己的特性。

第二方面是以对特指问句的分析来说明各种语言的相似性。在许多印欧语里,特指问句的疑问词必须移动到句子的边缘位置上去,而在汉语里,疑问词从表面上看并不需要移位。以原则及参数理论的方法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汉语疑问词在问句中的发问作用,也就是辖域(scope)特性,其实跟印欧语疑问词的差不多,对移动的各种限制,似乎都对汉语疑问词起作用。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是汉语的疑问词也要移动,只是移动发生的阶段不同,从表面上看不清罢了。

第三方面是名词性成分的所指与约束理论的关系。尽管 Chomsky 的约束理论三原则大致上适用于汉语,但在某些细节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是汉语的所谓长距离反身代词,即“自己”的特殊性质,原则及参数理论的灵活性在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后一点是关于空语类的讨论,这是汉语句法中探讨得很深入,但争议也最大的一个方面,而且看来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3. 汉语功能语法分析的最新发展

本章作者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毕永娥(Yung-O Biq),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戴浩一(James H. -Y. Tai)和加州大学 Santa Barbara 分校的 Sandra Thompson(唐娜迪)。

功能语法的基本观点是将语言结构看成人交际工具的体现,而不是某种抽象思维结构的物质载体;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应该来自语法之外,来自语言的功能,而不是语法之内,不是形式化的抽象原则与技术手段。汉语功能语法源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七十年代随着功能主义的问世而初具规模,八十年代逐渐壮大。到了九十年代,功能语法大致上形成了五个研究方向:语义,认知,功能句法、语用和话语分析。

功能语法的语义研究观察汉语里一些具有特别功能的语素,诸如“会”,“就”,“才”以及某些指示代词,并从功能角度分析汉语被动式和使动式的作用。

以认知为基础的语法最初是戴浩一提出来的,他综合认知理论,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试图在此基础上认识汉语语法的真面目。其基本假设是句法结构源自观念结构,而观念结构则来自外部世界的结构。认知语法的主要研究领域有时间,空间,对事物的分类命名以及形象特征对汉语结构的影响。

功能句法研究特定的结构同交际功能的关系,象特定的语素“的”,“了”,“来”,“去”,以及被动结构,主题-述题结构,正反问句,条件从句等等。一些理论性的问题,象语序,语法关系和复合词构成也在其研究范围之内。

汉语功能语法的语用研究关心的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在交际过程中的合作,观察他们怎么运用及理解否定形式,以及象“又”,“也”,“就”这样的关联词。

功能语法的话语分析是前面几种研究的延伸,考察自然发生的口语和书面语的篇章结构。具体分析的对象包括句子的界定,回指,篇章标记,篇章种类,篇章同语法的关系等等。

4. 汉语声调的演化和声调重建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丁邦新(Pang-Hsin Ting)在本章先按音系发展为汉语划分了阶段,然后讨论了历史音系学的两个重要问题:声调的演化与声调重建。前者牵涉到汉语在某个阶段是否有音位学意义上的声调(phonemic tone)以及声调的分合现象,后者涉及从历史文献以

及现代方言的资料中为重建声调寻找证据。

历史音系学家一般都承认至少在古汉语时期(约公元 420 年起)就已经存在平、上、去、入这四个音位声调了,争议比较大的是在古汉语时期(公元前 1700—公元 200 年)到底有没有声调。象李方桂这样的传统音系学家认为当时的汉语有声调,而梅祖麟、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等学者认为当时的汉语音节以某些辅音结尾,这些辅音后来消失了,但其区分作用却作为音系特征保留下来,成为声调。丁邦新在这里提出三条证据,说明上古汉语确实有声调。一是由《诗经》中可以找到证据,说明某些不同调的音节可以押韵;二是谐声时代的书面记录(如甲骨文)将某些不同调的汉字列为发音相同;三是魏晋南北朝的押韵规律说明以不同辅音结尾的音节不能押韵。对这些现象的合理解释应该是那些押韵的音节可以是不同调的,但不能以不同的辅音结尾。

为了拟构某一古汉语声调的语音值,学者们常常比较不同方言的声调。丁邦新指出,不能只注意本调,而必须兼顾变调。有证据显示变调保存了较古的声调,而本调则可能代表后加的变化。

5. 汉语历史句法新论

法国东亚语言学研究中心的贝罗贝(Alain Peyraube)在回顾了汉语历史句法学的简短历程,并从句法角度为汉语划分了发展阶段之后,讨论了下列问题:(1)词序变化;(2)处置式;(3)被动式;(4)与格结构;(5)地点短语;(6)体貌后缀;(7)并列式;(8)动补式,指示助词,代词,量词及疑问词。

在词序变化方面,最具影响的是李讷与唐姗迪(Charles Li and Sandra Thompson)在七十年代提出的论点,说古汉语的 SVO 词序正在渐渐变成现代汉语的 SOV 词序。贝罗贝指出,这一观点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对于李讷与唐姗迪的另一个观点,即上古汉语的词序也是 SOV,贝罗贝认为证据不足,因为上古汉语占主导地位的词序是 SVO。

贝罗贝认为处置式的把字句,被动式的被字句以及与格结构的给字句都从 $V_1 NP_1 V_2 NP_2$ 这样的复杂谓语结构(serial verb construction)演化而来的。如果 NP_2 与 NP_1 同指, NP_2 就可能简化为代词或者干脆删掉。 NP_2 的删除又引发原本是 V_1 的“把”和“被”虚化(grammaticalize)成为介词。至于与格结构,则是作为 V_2 的“给”虚化了。

戴浩一曾经指出,引导地点短语的“在”是由古汉语的“於”通过替代而转化得来的,但贝罗贝认为“在”的前身是动词“著”和“在”,两者合并以后再进一步虚化而成为介词。

贝罗贝基本上采纳了梅祖麟的观点,主张体貌后缀“了”是由五个充当补语的动词合并而来,形成“V+O+了”这样一种结构,通过词序变化成为“V+了+O”。“了”然后先虚化成词组标记,再进一步虚化成体貌标记。

对于并列连词的演化,他也认为是经过了两个虚化过程,先从动词变成介词,再进一步虚化成连词。

贝罗贝还讨论了句法演变的几种方式,类比,词汇替代,词汇合并以及借用外来词。而最重要的过程则是虚化。

6. 方言历史的阶段与分层——横县、达县及石陂三地个案研究

本章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何大安撰写,由南加州大学的 Goerge Hayden 译成英文,目的是以方言中的反常现象来说明方言历史研究的一个方法问题,即反常现象反映了方言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或者不同方言层次的接触及混合。

广西横县平话中的第六声与第十声有着奇特的性质,在一种变调过程中,这两个调与低调

为伍,而在另一种变调过程中,这两种调又与高调为伍。何大安认为这种似乎矛盾的变调特性来自不同的历史阶段。早期的平话中,二、四、六、八、十声为一组,这种分组跟中古汉语的清浊声母之分相对应,即所谓的阴阳之分。六声和十声后来获取了高调的特征,变为与一、三、五、七、九声为一组。上面说的两种变调过程,前一种只与阳调有关,后一种只与高调有关,所以六声和十声会有两种不同的表现

四川达县长沙话的声调分布也很奇特。中古汉语的去声在现代方言中通常都是二分成阴阳两个调,但在达县长沙话中却是三分,而且无清晰的音系规律可寻。何大安认为可以从历史和地理因素中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线索。达县长沙话的三分调中的两个在长沙话移到达县去之前就有了,由文白异读引起,而第三个调是移到达县去以后受西南官话影响才形成的。

福建浦城石陂话的奇特之处则在于中古汉语全浊声母的分化,不象其他闽方言那样二分为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两种,石陂话将其三分为全浊,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而且似乎没有音系规律可寻。何大安解释说,保留全浊音是吴语的特征,石陂话显然是受吴语影响而保留了部分浊音。

7. 语言的多样性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本章作者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王子元(William S-Y. Wang)。在简单回顾了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及其地位以后,王子元讨论了中国境内语言的多样性,语言多样性与人口多样性的关系,汉语内部方言之间的相互关系,汉语和其他中国境内语言的关系,以及可能影响这些关系的因素。

王子元指出,过去几十年的方言调查积累了大量的丰富资料,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这些感性的资料,做出理性的分析,推进语言学的发展。他为此讨论了三种可以用来分析汉语方言资料的方法。一是距离估算法(distance methods),就是通过估算不同语言词汇之间的亲缘关系来推定语言之间的亲缘距离。这一方法由 Swadesh 在五十年代提出,徐通锵等人曾用来推算汉语方言之间的关系,其缺点是每次只能估算两个方言,因而需要改进。一条可行之路是借用近邻合并法(Neighbor Joining Method),通过换算建立近邻合并的树形图,把许多方言放在一起比较,从而推算不同方言之间的距离。

第二种办法是分析特征状态(character state)的最简过程法(parsimony methods)。这种方法由 Krishnamurti 在八十年代开始使用,通过计算由词汇扩散形成的音变来为印度境内语言分类。运用到汉语方言分析上来,可以选定几个特征,例如中古汉语全浊音的清化,然后找出该特征的有关状态,如保留全浊,清化并分化为送气与不送气,以及各种类型界限不清这三个状态。对特征状态的计算结果可以用不同的树形图来表示,方言之间的关系及演化过程则通过图中分隔两者之间的步骤来计算,步骤最少的就是应该选用的。

第三种方法以变化规律的扩散来计算语言变化的内部时间关系。这种计算方法的精髓用丁邦新的话来说就是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代平面性的子条件区别小方言。

8. 方言互通性的定量分析

伊利诺依大学的郑锦全在本章的开头指出,通常用来判定语言或方言之间关系的所谓“互通性”(mutual intelligibility),其实都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上的,而真正有说服力的判断标准,必须是客观的。不同语言之间的“互通性”有个程度问题,由通到不通是个渐变过程,但在进行判断时却常常当做突变来处理,或者互通,或者不通。他因此提出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具体语言特征的表现进行计算,以数字结果来表达互通性

郑锦全将《汉语方音字汇》里列出的 2763 个单音节词输入计算机,按下面的方法进行计算判断。一是将每个音节分解成声母、韵头、韵腹、韵尾和声调五个比较单位,对 2763 个词的每一个单位都进行方言之间的比较。每个方言都有一次按扩散源计算,另一次按扩散对象计算,这样对任何一个比较单位都会作 $17 \times 16 = 272$ 次比较。如果某一个单位被认定在两种方言之间有对应关系,就输入计算机作为一次对应,然后计算频率。

二是对于找到的对应(相同或不同)加以区分,以决定其在判断互通性中所能起的作用。区分的标准是:(a)在两种方言之间找到的某种对应如果在所有词条中占的比例很大,就作为“讯号”,给予互通性中的正值,如果这一对应占的比例很小,就作为“杂音”,给予负值;(b)“讯号”有一个渐降的重要性标尺(weight scale)，“讯号”的重要性在标尺上的地位取决于对应来自相同还是不同,是否出现在扩散源的其他地方;(c)“杂音”有一个渐升的(负值)重要性标尺,“杂音”在标尺上的地位也取决于上面这些条件。

三是在方言之间建立一个以百分比表示的互通性指数,将所有比较单位的互通值相加,再除以 2763,就得到这一指数。

在互通性指数的基础上可以为方言之间建立亲属关系,并以此进行方言的分类。郑锦全得出的结果跟传统分类法的结果十分相近。

9. 语言习得发展与汉语的儿童语言

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行德(Thomas Hun-Tak Lee)指出,过去的十几年里,汉语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一个章节不可能全部包容,所以他只能介绍其中的一个方面,即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习得研究。

在汉语音系特征的习得方面,李行德讨论了音位习得的顺序和声调的习得。一种流行的理论是儿童的音系习得有个“中断”过程,也就是在最初的发声阶段似乎什么音都能发,但进入母语的发声阶段时却只能发少数的音,而汉语儿童习得的研究结果却证明中断不一定存在。另一个流行的理论是各种音位或音系对立的习得有固定的顺序,但汉语儿童语言的习得似乎并不完全按照一般的顺序。他还讨论了声调与音段习得的顺序问题。

在汉语句法的习得方面,李行德介绍了对语法范畴和句法关系习得的研究。还讨论了对下面这些句法现象的习得研究:词序和论元角色之间的关系,汉语的基本句型,把字句、被字句这些特殊句型,动词前介词短语及动词后介词短语的特性。母语为汉语的儿童似乎先习得动词后介词短语,然后是动词前短语。儿童似乎先会用零位主语和宾语,然后再会用定语从句,宾语从句和并列句。

语义和语用的习得研究则着重介绍了下列方面:数量词的辖域,照应现象,代词、时间地点词的回指,量词的用法,疑问句的运用等。

汉语儿童语言的研究显然对整个语言习得研究有很大的贡献,对于理解普遍语法有很大帮助,但李行德也指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一是有些领域还没有涉及,如翘舌音的习得似乎还没有人做过,句法中的主题与主语差别的习得,甚至动宾结构的习得也还知之甚少。另外,由于很多习得研究是在中国境外或双方言地区进行的,双语或双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可能影响也不可忽略。

10. 神经语言学的汉语观

台湾中正大学的洪兰(Daisy L. Hung)和曾志朗(Ovid T. - L. Tzeng)在本章花了很大篇幅介绍认知科学和神经语言学的历史。自从 Broca 和 Wernicke 在上一世纪发现大脑某一特殊部位受伤的病人会出现失语症以后,对各种失语症病人的研究大大推进了对语言 and 大脑关系的

认识,研究这一关系的神经语言学也在过去几十年有了很大发展。由于大量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是以说印欧语的失语症病人为对象,得出的结果和对现象的解释就受到了局限。对说汉语的失语症病人的研究近年来迅速发展,弥补了这一缺陷。

失语症病人的名词动词分离现象(noun-verb disassociati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患 Broca 失语症的病人对具体物件的描述有困难,而患 Wernicke 失语症的病人则对描述动作有困难。对于这种动词和名词的分离,有三种可能的解释方法。语义-概念理论认为大脑处理动作语义的部位跟处理物体概念的部位不同,因而受损部位不同会造成失语症表现的不同。句法-形态理论则从动词与名词在形态变化上的区别来解释这一差别,动词在句子中的形态变化比名词复杂,所以当大脑的形态处理机能受到损害时,名词-动词的差别就会作为副产品出现。词汇处理过程理论则主张词汇内部按分类排列,由大脑不同的部位处理,因而会有名词-动词的分离。由于汉语基本上没有动词或名词的形态变化,但是说汉语的失语症病人明显地有名词-动词分离症状,所以形态处理机能不应该作为解释。对汉语复合词的研究也表明失语症病人在选择语素时有区分动作和物件的困难,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经过修正的词汇处理过程理论。汉语失语症病人在选用量词上的困难是另一个研究得较多的领域,其成果使得修正建立在其他语言上的理论变得十分必要。

通讯地址:香港九龙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系

书 讯

《话语分析方法》(Approaches to Discourse), Deborah Schiffrin 著, Oxford: Blackwell, 1994. Pp. ix, 1-470.

本书是 Blackwell 语言学教科书系列的一种,这一系列中已出版的还有《支配与约束理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社会语言学导论》(第二版)(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理解话语》(Understanding Utterances)和《生成语法中的音系学》(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本书作者任教于乔治顿大学,是有名的话语分析专家,著有《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1987)一书。

本书的目的是以系统连贯的方式澄清话语分析中的一些问题和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都是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共同关心的。书中对话语分析的六种方法作了详细的阐述和比较,这六种方法是:(1)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 (2)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 (3)信递人种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4)语用学(Pragmatics), (5)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6)变异分析(Variation Analysis)。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话语分析的范围”是对六种分析方法的概述,重点讨论在界定“话语”的范围时遇到的困难。第二部分,“话语分析的方法”分章详述每一种分析方法。为了使读者有一感性知识,每一种分析方法都有一个样本分析,从中展现出每种方法的长处和短处。第三部分“结论”对六种分析方法作系统的比较,说明在处理结构和功能、语篇和语境、语言和信递这三对关系上存在的差异,并试图找出把多种方法综合起来的脉络。书末有两个附录很有用,一个是“语料收集指南”,介绍了五种可收集分析的材料来源,一个是“常用转写符号”,供转写录音材料时参考使用。

(稼宣)